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选举：理念与制度

冯 莉 著

学林出版社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选举：理念与制度

冯 莉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选举:理念与制度/冯莉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80730 - 839 - 3

I. 中… II. 冯… III. 选举制度—研究—中国
IV. D621.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0801 号

中国选举:理念与制度



作 者	冯 莉
责任编辑	李西曦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在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	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4 万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30 - 839 - 3/D • 35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重新认识中国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序言

童世骏

在新中国成立 60 年之际推出的这套丛书,是为了更好地重新认识中国。

近年来,谈论“重新认识中国”的,常常是国际场合。面对这个变化迅速、面貌多样的古老国度的时候,外国人常常会感慨他们先前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已基本过时;受到外国人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的时候,中国人也常常感到有必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不管是先前连续多年保持经济高速度增长,还是当前在全球经济一派萧条景象中依然保持宝贵的自信和信誉;不管是举全国之力战胜特大地震,还是向世界展示美轮美奂的奥运盛况——近年来我们确实有不少理由庆幸,我们没有让重新认识着中国的朋友们失望,也没有让重新认识着中国的其他人小看或轻松。

但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不仅是外国人,而且是我们自己——更确切些说,首先是我们自己。外国人有的把中国当作一个“问题”甚至“威胁”,有的把中国当作一种“范式”甚至“榜样”,这些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但不宜被我们奉作权威。对我们来说,“重新认识中国”是对自己、对子孙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更好地为人类作贡献的前提。

比方说,五四运动 90 年之后,中国的“传统”到底是什么,需要

重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60 年当中，中国的“现实”发生了哪些变化，也需要重新认识。30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职业活动、这一代人留给后代们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等等。这些都需要重新认识，特别是需要我们自己来重新认识。

又比方说，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求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重新认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意味着我们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但我们又要看到，已载入宪法的这条原则，在今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实语境的。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因此，在“不要资本主义”的同时，我们还是可以“要资本”的。理论上得到论证的这个道理，是否真能实现？我们是否确实能够一方面利用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另一方面遏制资本的野蛮化趋势？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答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社会主义。但经过 60 年的新中国建设和 30 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知道“科学”一方面必须与“人文”相结合，另一方面必须与“民主”相结合。这两个“结合”不容易，如西方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争和“民主政治”与“专家政治”之争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设法实现这两个结合：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就是要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说“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民主像我们的社会主义一样也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像社会主义一样也还要大大往前发展。理论上得到论证的这些道理，是否真能实现？我们是否确实能够把科学和民主内在地、有机地统一在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活动当中？这些问题也没有现成答案。

我们的社会主义当然也是具有具体特点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超越一切地域、时代和文化个性的社会主义。不管是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道理，还是作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常识，这一点都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国情特点和国际地位有更加全面

的认识。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也要更加注重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并且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些理论上经过论证的要求如何转变为具有具体可行性的实践措施，也需要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邓小平说过，“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对外国人重新认识中国，而且对我们的自我认识，也是一个严峻挑战。认识中国意味着“了解中国”和“理解中国”，这两者虽可以适当区分，但终究是相互依赖的：“理解”的基础是“了解”，而真正意义上的“了解”也离不开“理解”。“理解”中国不仅要描述中国（知其必然），而且要解释中国（知其所以然）和评价中国（知其所当然）。对中国作这种意义上的“理解”，中国人有独特优势，但也需要格外小心：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国，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观察，但也切不可没有客观的观察。对中国的国情，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让我们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子孙后代的崇高责任，持着对知识、对真理、对科学的研究的满腔热情，更好地认识中国，更好地重新认识中国吧！

2009年3月

序

肖巍

马克思主义认为，参加选举是理解民主最好的途径。选举这个题目，其实早在一个甲子前的 1945 年，毛泽东回应黄炎培“王朝兴亡周期率”时就非常自信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石，选举已经成为现代政治体系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最合法最有效的权力移交途径。人民通过所选举出来的代表参与政治事务，参与公共管理，这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以及中国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具有不同凡响的研究意义。

追溯起来，在来自西方的现代化工业、科技和思潮的猛烈冲击下，天朝上国的臣民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追求民主和科学，开始了从臣民到人民，再到公民的转变。当年孙中山先生就身体力行主导了第一次全国性的选举活动；革命战争年代，尽管战乱频仍，选举这种形式还是顽强地延续了下来，根据地时期的选举民主更是别开生面。建国以后，新中国的选举可圈可点，有过辉煌的业绩，也有难堪的记录……到了后来，谈论选举甚至一度成了畏途。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群体利益的多元化，各种利益方表达的愿望空前强烈了，中国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今非昔比，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大格局中，各种选举都在尝试进行，出现了许多亮点，尤其迈小步、不停步、有进步的“碎步前进”政治发展模式越来越被认可。无论是基层选举，还是人大代表选举，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实践正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我国仍然处在一个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聚集,在公民意识薄弱、市场经济发展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民主法制都还不健全的情况下,选举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不端”行为,贿选、操纵甚至暴力。这固然有选举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恐怕更深刻地还是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的某些缺陷。如何使民心、官为与制度资源得以有效地贯通,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民主选举,大有文章可做。

冯莉的论文通过对我国选举状况的梳理,认为选举是实现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重要方式。她在对世界选举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概括出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乃是推进选举现代化的两个“引擎”。但是我国长期造就的臣民意识影响深远,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还远没有理顺,因此,要解决选举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必须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理念上的刷新,要加快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公民选举理念的发展;二是制度上的完备,健全和完善具有前瞻性且具备中国特色的选举规制;三是充分的实践,要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推进大家对选举的认识、认知和认可,从而增强对国家和法治的认同。

当然,选举的现代化不是一朝一夕即能实现,如果以 20 世纪初的北洋政府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作为我国选举迈向现代化的开始,那么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选举历程表明,搞好我国的选举,最重要的是需要立足自己的国情,这是我们解决国内各种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离开了这个前提和基础,搞出来的选举只会水土不服,甚至面目全非,与原先的美好愿望也必背道而驰。

选举是一门学问。从选举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算起,研究选举就不仅仅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道路上的必然,而且是一项繁重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尤其是对个人而言,选择这样的题目来做比较深入的研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相信作者的研究所得对我国选举的进步能有所裨益。

希望冯莉能继续走下去,越走越稳健,越走越精神。
是序。

2009 年 5 月 复旦

前 言

自选举出现在人类政治生活中，便从此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常态，而选举惟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主权在民。

一、研究背景

2003年春夏之交，深圳区级人大换届选举中出现了选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候选人张贴海报作自我宣传、非候选人击败正式候选人胜出、选民要求罢免新当选的人大代表等一连串令人目不暇接的事件；同年底，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出现了数十名高校学生、房产维权业主和学者、律师等专业人士寻求选民提名，参与人大代表角逐。采用张贴海报、派发传单、出动宣传车、召开记者招待会、网络对话等多种形式与选民互动；仍然是同一年，湖北省潜江市第五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期间，也出现了包括在职和退休教师、村委会主任、法律工作者、工人、农民在内共41人集体竞选的情况……这些事件不仅是对我国县级人大选举实践的探索，而且给我国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出了新课题。

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在我国，对于选举，很多人都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所以说点什么，其实又常常说不出什么来。久已习惯臣民文化的大众往往处在非常矛盾的困境：既对公共事务甘于退避和漠视，又对政治参与充满着期待和热情；既渴望透明和公正，却又易被现有的游戏规则所俘虏，所以我们的选举总是显得粗糙和容易被操纵。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这样的原因：选举理念不到位，选举实践不充分，选举制度不完善。

民主与法治是实现选举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是推进选举现代化的两个“引擎”，实践是理解民主选举的最好途径。但就我国目前的选举状况而言，其艰难之处恰就在于此。而且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短时期难以大踏步地解决推动选举的这些根本要素。“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①只有抓住了这个根本，用先进的理念引导并产生规范的具有科学前瞻性的制度，才有突破的希望。

“在民主政治里……只有通过选举，人民才能当君主，因为选举表现了人民的意志。”^②西方代议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思想先行一步的西方选举观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选举实践来说有借鉴意义，但也不能照抄照搬，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形势比较好，但政治体制改革只能逐步推进。选举改革可以成为发展民主政治、推进依法治国、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突破口。

二、研究准备

我国在历史上的皇权专制时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选举，各级官员主要是通过荐举。除了对如何选拔和任用人才有所描述外，专门的研究很少，而且即使是描述，也零星散落在大量著作里。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页。

现代意义上的选举概念是在 19 世纪上半叶和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一起破入中国大门的,从那时起,中国才开始睁眼看世界。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对西方政治制度开始有所感慨,魏源遵友人林则徐嘱托写就的《海国图志》中还专门介绍了美英等国的政治制度,对选举作了大量描述。清王朝末年,在君主立宪的呼声中,清政府也在选举的名义下推动了资政院和咨议局的开设。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清末的这个动作标志着我国具有现代历史意义的选举的开端。

民国年间,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抨击旧中国制度文化的潮流汹涌而来。孙中山在其著作中不仅大量介绍了西方政治制度,还勇于对这些制度提出批评并大胆改进。认为西方议会政治是代议制,是间接民主,不能真正体现人民意志,要使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人民就要能实现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并在《临时约法》中,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民众的基本权利,为把臣民训练成公民,打破旧制度的精神枷锁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的选举开始落实到制度,公民意识也开始出现。

“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存在形式,它表现为人们对‘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又体现为保障与促进公民权利,合理配置国家权力资源的各种理论思想。”^①“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和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②孙中山在这方面推动了一大步。然而,随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名存实亡,民众刚刚兴起的参政热情又被压制下去了。虽然国民政府时期,某些农村在村治过程中出现过直接选举现象,但也只是一点点微弱的星火。总体上,国民政府的选举都是特定的战争年代的产物,形式大于内容,易于被政党操控,并最终形成独裁局面。

① 李龙、周刚志:《论公民意识的法治价值》,《浙江社会科学》2001 年第 1 期。

②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云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8 页。

到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共产党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为主，大力传播民主的价值和民主的正义性，强调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标准是看这个国家是否主权在民。1941年2月13日，谢觉哉在《论选举运动的重要》一文中解读说：“民主是人民做主来管理国家的事，议国家的事。选举是组织民主政治的开端，没有选举，民主政治开不得张。”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选举权》，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文章指出，选举必须是真正的普选制：“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文章强调选举不能规定什么资格条件：“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当作投票的工具罢了。”《新华日报》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介绍英美国家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认为要学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①

还有许多影响比较大的独立媒体，如《大公报》对当时国民党和中共包括选举在内的政治建设进行了一定深度的评析，许多至今仍都有相当影响力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也翻译和介绍了一批相当有影响的西方经典学术著作，对国人了解和研究西方政治文化、培养公民和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选举制度可以追溯到根据地建设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推行如“三三制”的

^① 王铁群：《中共抗战时期的民主主张与实践》，《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

选举安排以及“豆选”等多种方式来推动各阶层群众的政治参与，普通老百姓有了可以直接参与政权建设的权力和机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举制度研究》(王颖,2005)等著作描述和分析了这段时期的民主选举状况。

建国以后的1953年,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第一部选举法诞生。1954年,第一部宪法诞生。这一年6月,在全国完成了第一次普选,并在普选的基础上逐级选举产生了上级人大代表和本级政权机关,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新中国的人民政权第一次建立在普选的基础上。

我国的选举和政治气候是密切关联的。在选举法公布前后这一时期,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使得各界人士对民众政治参与和选举都表示了极大热情,最明显的就是对苏联选举制度的大量介绍。1953年,有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译室编的《苏联选举法令汇编》,中央选举委员会办公室编的《选举工作手册》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青年要参加选举与选举工作》等,翻译出版的有《苏联选举制度》(维辛斯基,1949),《选举·选举制度》(列文等,1953),《地方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选举》(聂莫夫,1955)等。选举思想的普及,鼓舞了人民的参政积极性。

从1958年以后,人们就很少看到有关选举的著作了,国家也几乎没有再举行过大规模的选举。一直到“文革”结束,伴随着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政治环境逐步宽松和正常化,特别是农村选举实践异常活跃,关于选举的研究,从基层实践开始逐渐涌现。

我国的选举研究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村民自治选举研究。这方面,主要是《中国村民自治前沿》(王振耀等主编,2000)以及“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白钢主编,2001),对基层村委会选举的各项程序,针对基层选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诸多建议。一个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的研究,具代表性的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研究》(都淦主编,1990),对1990年以前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分析。《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蔡定剑,1998)及其“人民代表大会与议

会研究丛书”系列(2002)、《直接选举：制度与过程》(史卫民、雷兢璇,1999)、《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史卫民,2000)、《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刘智等,2001)。这些著述通过大量实证材料对基层人大选举作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还有一个关于党组织系统的选举,到目前为止研究者还比较少,没有形成专门的著作,关注点有党内民主、“两票制”等。

与此同时,对国外选举,比如英、美、法、德、日的研究以及国家间选举制度的比较研究非常多,比如《选举漫语》(陈荷夫,1983)、《中外选举制度比较》(胡盛仪,2000)、《中外代议制度比较》(田穗生,2000)等。2004年美国大选期间我国专门派出参观团去进行实地观察。2008年又是美国总统换届选举年,出现了女候选人(希拉里)、黑人候选人(奥巴马)等亮点,同样非常值得关注。当然,在全球化背景中,由于信息化的力量,各国的选举也开始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甚至冲击,选举活动受到国外势力干涉而导致国内政局动荡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随着各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选举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也在继续,在各国具有各自特点的同时,选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共同性的问题和难题。2003年赵心树教授发表《选举的困境——民选制度及宪政改革批判》,次年发表《走出选举的困境：说民主故事,谈民主未来》一书,以美国选举为中心,深刻剖析了现代选举中的各种困境以及解决办法,并对我国的选举提出了很多建议。

以上这些研究,特点之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以实证为主,比较注重实际应用,调查材料、案例和数字。之二是从总体上看,就我国而言,对基层的研究比较多,中层较少,高层更少,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之三是对制度层面关注的比较多,针对我国选举的理念层面关注的相对比较少。尤其是事关选举的最基本的民主、法治、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实践之间的综合探讨和研究非常缺乏。但近年来,随着我国选举实践的进展,这个问题已开始引起了关注。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深入进行的进程中,确认式选举制度正在向竞争性选举制度过渡。推动这一制度变迁的深层动力,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而兴起的公民自觉、自主地在

制度框架内进行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2003年中国深圳经济特区的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多发性地出现了这种政治参与的案例，这些案例在当前中国基层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正在转型，也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正向新的阶段迈进。^①

三、主要内 容

选举不是公民生活的全部。选举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为公民的自身特征就包括了选举的权利运作，而且还反映了现代民主的精神，已经成为民主政治的一个制度化设计。同时它还聚焦了社会的兴奋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都可能在选举中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本书的目的无意于对选举方方面面的通体研究，这当然也是本人力不从心的地方；重点也不在于对实际案例仔仔细细的实证考察，而是用逻辑推理和比较的方式，辅之以案例佐证，以我国独有的“碎步政治改革”经验的积累为基础，得出在我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中，选举现代化所必需的理念和制度限定以及如何实事求是地推动我国有序的政治参与和选举的进步。

搞好选举要实事求是。我国选举的现代化需要在民主、法治、道德等层面实现理念上的更新，需要制度的及时跟进和恰当救济，在借鉴先进和成熟的民主国家实践的基础上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大进步。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围绕选举的理念与制度这个主题，同时附以具体案例供充分解析，共分以下六章：

第一章是对本书内容的概述。

^① 参见 Huang Weiping, Tang Juan and Zou Shubin:《Consciou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ry and Transformation of Electoral Institu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2003 Competitive Election for Deputies to District People's Congress in Shenzhen》，引自《SOCIAL SCIENCES IN CHINA》，Spring 2004。

第二章主要讨论民主与法治和选举之间的关系。现代政治无疑包括了选举政治，选举已被公认为在民主政治框架内实现权力移交的合法途径。民主与法治是完善现代选举和我国有序政治参与的根本要件。

第三章讲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对选举的重要意义。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同时成为选举改革发展的两大“引擎”。有公民才有选举，在政治参与扩大化的趋势下，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在我国，现代选举的完成必须依赖公民社会的成熟和市场经济公平、公正、公开、有序等原则的深入人心。走公民社会之路，是达成我国选举现代化的基本理念。

第四章是对我国选举历史与现状的分析。包括我国选举发展的过去与现在的态势以及公民社会发展的过程梳理，并以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为区分标准，描述、分析和探讨了我国基层选举、人民代表选举以及党组织系统选举。还通过纵横比较，粗略归纳出了我国选举发展的逻辑特征。

第五章提出我国选举发展的路径选择。在我国民主、法治、公民、市场经济等各项条件不完全发展以及先天基础薄弱的情况下，要更好地理解选举，就必须通过广泛的选举实践，而农村基层选举的蓬勃发展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实践发展的同时，还要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在法律意义上及时跟进选举制度新规则的确认。解决理念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选举制度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对解决眼下的选举难题是有益处的，因此有必要对现行选举制度进行符合实际的、有一定前瞻性的改进设计。当然，这也有助于促进公民社会以及选举实践等的发展。

第六章就国际国内选举的现状，对选举中出现的少数人的权利、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微弱多数的胜利所带来的问题等现代民主选举的“通病”提出自己的思考。这都是实事求是搞好我们的选举所应警惕和关注的。因此，我们必须扎根我国的国情，充分挖掘和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努力实现我国选举的现代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代化。

建设和实现更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件伟大而艰难的事

业，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问时指出：“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1945年7月，在延安考察了几日后，毛泽东问黄炎培感想如何，黄炎培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接着说：“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①

在这段话中，黄炎培回答的“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就是民众的知情权和决定权，这是民主的前提和关键。试想，如果民众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和原委，哪来的正确决策，必是假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而非真实的民主。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一书中说，民主存在着这样五项标准：“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资格。”而“只有在成员有足够的机会以询问、讨论和协商的方式来了解社团面临的问题时，他们才能够

^① 李传玺：《中国当代史的一个结——全面理解毛、黄对话》，《安徽统一战线》2003年第12期。